

第一编 概 论

第一章 上 古 时 代

人们说，人是有信仰的动物。我们韩民族也是自有社会生活以来就有了信仰。韩民族的信仰是从自然崇拜开始的。在原始时代，人们惊叹大自然的不可思议和神妙构成，认为这里有精灵，所以崇拜日月星辰或山川等物。他们认为，动物、怪岩，奇树乃至万物无一不存在精灵，因而崇拜其神秘力和不可思议力。他们认为，这种精灵能左右人间的生活与祸福，所以为避开精灵的祸害，以便过安心和欢喜的生活，就以许多供物和牺牲举行祭祀。这就是万物有灵论（Animism）。韩民族的宗教生活就是从这种万物有灵论开始的。

随着万物有灵论的发展，就产生了我们上古时代的神教。神教崇拜自然物体，崇信主管特定事情的神，并信仰人的灵魂。它认为，人的灵魂不灭，并且按照生前行为的善恶，死后就化为善灵或恶灵。它认为，祖先的灵魂由于后人服务而能享受冥福，而后人则因为祖先的灵魂可避免灾祸。于是，人们就崇拜和祭祀祖先的灵魂。

在大自然的许多物体中，人们对太阳格外崇拜。《礼记》写道：“黑有鬼神，亮有礼乐”，即认为在光明的地方，

鬼神不能活动，就要躲开。韩民族也相信，太阳为光明的根本、是生化育成万物的大主宰，可镇摄一切有害精灵，给人以欢喜和礼乐。太阳是天上的具体存在，被称为天帝、天公、天神等。上古时代，为祈求大主宰天公降福，去除恶灵的灾祸，安心立命，举行了许多神事。

举行这种神事有两种方法，即向最高主宰神天神祈祷，表示哀愿和对魔神施行压胜、咒术、祓禊。这些宗教仪式只能通过有神和人之间负责神事的巫师进行。《左传》说：“国家的大事是祭祀和军事”。在上古时代，政事极其简单，而宗教仪式则是氏族社会活动的大部分。这时负责神事的巫师掌握了氏族的政事。但后来，随着氏族政治发展为村落政治，又发展为部族政治，政事便掌握在君主手里，巫师成了只负责神事的司祭。

我们把经过巫师的中间作用向天神祭祀，举行咒术的宗教称之为神教，但许多学者叫它萨满教（Shamanism）。这种原始信仰广泛流行于西伯利亚、日本和满蒙地区的乌拉尔-阿尔泰（Ural-Altai）语系各民族之间。有些学者把这种神教叫做仙教、巫教、明神道。甚至有的人认为，它的内容与中国的道教相似，因而把它放在道教的范畴之内。但是，大体上说来，这种原始信仰崇拜精灵。巫师在山中用树木、石头围起圈子，居住在其中，介于神和人中间，向人启示神意，或负责去除人间疾苦和不安宁的咒术，并通过咒术或医术研究长生不老的方法。这些与中国仙教有些相同的地方，可以叫仙教，但称为神教是妥当的。

人们把负责神事的巫师叫做神人或仙人。神人意味着与天神交往、负责神事的人。仙人的意思是住在山里，修行仙

道的人。

我们历史上最初以神人或仙人出现的就是檀君。人们把檀君尊称为檀君神人或檀君仙人。他的父亲和祖父桓雄和桓因也是神人。并且，檀君的后嗣代代都是神人，执行祭祀和政治两件事。后来檀君政权一倒，奇子朝鲜出现，檀君神人被剥夺了政权，便进山只管神事。

进入三国时代，王权开始伸张。不能参与政治的巫师一党以男巫和女巫进行活动，只管神事。这样，历来跟随神人的神教徒便以神人或仙人作为中心，变成了练习不老长生法和武艺的特殊集团。这就是高句丽的皂衣仙人、新罗的花郎团。他们就像从中国仙家蜕化而产生的、到后汉时代修行炼丹和导引法的五斗米道集团一样。

到三国时代，巫师的政权被君长完全夺走之后，韩民族中间祭祀精灵的鬼神信仰依然盛行。巫师下山到民众中（更不用说朝廷）广泛举办民间神事。鬼神信仰、神教作为通俗信仰，席卷三国上下。朝廷按节期举行国家的大神事。百姓也为了招福禳灾几乎每天叫巫师办巫事。高句丽中叶，第十七代小兽林王二年，佛僧顺道意外地从秦国将佛教传入高句丽。高句丽朝廷欢迎外来宗教。它透过当时的通俗信仰神教，渐渐兴盛。第十九代广开土王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在平壤建了 9 个壮丽的寺院。之后，比高句丽晚 40 年，佛教传入百济。因为佛教是印度的宫廷宗教，传入中国又成为贵族阶级的宗教，所以传入百济的佛教也受到国王和贵族的赏识。信佛者日益增加，佛教势力就壮大起来了。在接受佛教方面，高句丽接受了中国北部的佛教，而百济由于与大陆交通受阻，就接受了南朝系的佛教。

佛教传入高句丽和百济时受到国王和朝廷的欢迎。但佛教传入新罗比高句丽约晚 50 年，由于朝臣排外，一度没有弘通。直到法兴王五十五年异次顿殉教，才开辟了兴法弘教之路。

传到三国的佛教不仅受到王朝庇护，而且在教理方面，佛教下乘的教理虽与三国固有的神教信仰并不一致，但佛教与固有信仰有了调和的、急剧的发展。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三国已成为佛教国家。全国各地出现了巨大的伽蓝堂塔。同时，由于佛教信仰，建筑、绘画、雕刻、音乐等文化艺术有了飞速的发展。

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否定了佛教教理内含的空观思想、超国家思想，而把它作为现世利益的祈祷信仰、或作为国祚拥护的护国宗教信仰，从而出现了与佛教本来教理相反的形态。但另一方面，作为佛教本质之一的人生无常思想和因果报应思想等对三国人民有不少影响。于是，信仰佛教的很多信徒对人生便有了空虚的想法，乃至新罗和百济下令禁止杀生，实行放生，禁止渔猎，致力于劝善惩恶。

三国都奖励佛教，以慈悲和忍辱为本的佛教很兴盛。它们均以禁止杀生、实行放生，致力于善事，建设东方净土为理想。但是，三国在数百年间却在同族之间进行相互残杀。

在三国佛教兴隆发展的时候，高句丽末年，唐朝道教传入，国人争先信仰。高句丽是在权臣渊盖苏文的关照下引进道教的。他说，儒、佛、道三教等于鼎足，但天下只有术未能传开。因此，他劝宝藏王从唐朝请来了道士。本来，高句丽是把天象山川神格化、由巫师与神祇、鬼灵交往的神教信仰最为盛行的国家。所以，有鬼神信仰内容的道教一传

入，高句丽的神教信仰和唐朝的道教信仰融合起来，钻进了民间信仰之中。因此，高句丽末年的道教势力非常兴旺。

信仰护国佛教的新罗借唐朝的力量讨灭百济，征伐高句丽，统一了三国。新罗认为，这是由于法力所致，因而举国上下更为奖励佛教，把新罗建成为一大佛教王国。新罗统一三国后，营造了更多的伽蓝、寺塔、佛像。通过佛教营造事业，文化艺术的发展已达到极其优美的高度。许多新罗佛僧入唐留学，在输入唐朝的文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三国在新罗统一以前尚处于研究、阐明佛教教理的时期，新罗统一之后，佛教教理研究已经完成。赴唐留学佛僧接连返国，对新罗佛教起了分派的作用，形成了教宗的分立时代，创建了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律宗等教派法门，名僧大德辈出。元晓、义湘、慈藏、惠通、明朗、憬兴、梵修、慧昭、惠哲、无染、体证、智诜、兢让、真澈、行寂等名僧大德，就是这个时期的人物。他们阐明了佛教理论，佛教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宗派有了值得夸耀的教理和教祖，连续出现了学德兼备的高僧。新罗统一的一、二百年间呈现出百花竞放的盛况。

当佛教出现亘古未有的盛况时，在第三十三代圣德王时期，儒教从唐朝传入。在这以前，不是没有儒教。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建立了大学，并设置了国子博士和大学博士。在百济，早在第八代古尔王时期，一个名叫王仁的博士已将《论语》和《千字文》带去日本。由此可见，儒学早已传播。然而，这与其看作儒教，倒不如视为汉学更为妥当。假如看作汉学，也不过是训诂文学或词章文学而已。到圣德王时期，王子金守忠赴唐，带回孔子像和10哲72弟子的画像。

国王将其奉安于国学，并行释尊之礼。从此，历来不过是训诂文学的儒学，带着宗教的性质传到了新罗。之后，历代国王到国学叩拜孔子像并听讲。到元圣王时代，五经三史已作为文官的考试科目。宪康王时期，派王子金听、儒生金允夫、金立之等12人赴唐专攻儒学，送大学生崔利贞、金叔贝、朴季业等入唐留学，以图回国后振兴儒学。但是，由于佛教势力大，儒学未能兴起。

不仅儒教如此，中国道教传到新罗后，其势力亦未能伸展。据说，金仁问等人读过很多老庄浮屠之说。孝成王时期，唐朝玄宗送来了老子道德经。上流阶级中也有过一些对中国道教感兴趣而研究老庄之说的人。但是，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并未占有一定的地位。道教的道观一处也未能创办，道家的思想不过只为民族信仰神教所融和和摄取而已。

儒教，道教的势力都未能扩张，只有佛教在王朝的庇护下有了巨大发展。到新罗末年，佛教已发展到顶点，以致一个时期失去了朝气。这时，从中国传来了以达摩大师为开山祖的革新佛教禅宗。它压倒了历来以理论为中心的教宗佛教，给新罗佛教界带来了一大转折。这样，教门诸家像秦国时代张仪不敢抬头一样，经过学僧的努力而形成的有关教宗的疏述和言论等都成了无用的废物。从前的佛教以理论为中心，所以入门难。新罗末期传来的给佛教带来巨大革新的禅宗，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它提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这就是排斥艰难的理论修学和修证，立即悟道成佛，因而吸引了很多佛僧和信徒。

第二章 高丽时代

到高丽时代，由于太祖王建对佛教实行的教政大方针，佛教作为护国宗教受到朝廷的庇护，有了更大的发展。

高丽太祖是一位能力和有抱负的君主，他统一了三国。但他认为，建国伟业的成功完全是依靠佛陀之力。所以，统一前后修建了很多佛寺和堂塔，并命令全国州县建筑裨补寺塔3500个。他在晚年让第五王子出家。这样，王建归依佛教，使佛教界得到新的力量。教学各宗派在新罗末期的衰退已有转机，禅宗也有了朝气。

太祖王建大兴佛教，同时对历来的神教信心很深。他向天神、五岳名山、大川祭祀，恢复了新罗时代的遗法八关会。由于他留下的遗训，使神教在佛教全盛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其命脉。

第三代定宗将谷物7万石下赐大寺刹，以培养学僧。第四代光宗时期，按照儒教科举法，设立僧科制，把法阶分为7级，选第5级三重大师以上的高僧当国王的老师，作为王师或国师。依据二师制度，惠居任国师、坦文任王师。这样，佛教受到国家的保护，僧侣得到国家的优厚待遇。金枝玉叶般尊贵的王子出家的有近10人，世家富贵的公卿大夫子弟出家的也不少。佛教在朝廷大树的庇荫下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僧侣地位的提高，城乡的僧侣逐渐学会俗风。他们不求精进，不守佛戒，而贪图僧位和财利，有的甚至过着出入酒色之家的不检点生活。

随着佛教极度发展，出现了很多佛弊。同时，教宗和禅宗

互相诽谤，称对方为异端，是左道，不是真谛。讲慈悲和融和的僧侣之间纠葛很深。这样，佛教一方面堕落，另一方面内部冲突极大，所以处境艰难。这时，第十一代文宗之子大觉国师义天出现。他又一次给佛教界带来了朝气。受君后宠爱的义天入宋，巡礼名刹并修行，向名僧大德学习五宗法要，特别是专攻华严和天台两种奥义。回国后，他主张终止禅教两宗的法争，给两宗的融和以很大帮助。他又开创天台宗，大力扩大其势力，给全体佛教界注入了很大的活力。

与义天所宣扬的天台宗对峙的有主唱祖师禅的圆应国师学一和他之后的坦然、之印、德素等大德。他们的出现曾扬起玄风，但禅宗也衰微起来，难逃时代的厄运。到神宗、熙宗时期，出现了稀有的天才普照国师知讷。他倡导独立的禅宗，挽回了走上衰败之路的禅宗的教势，使禅宗进一步融摄教宗，为日后创立两宗合流的韩国唯一佛教宗派曹溪宗打好了基础。

义天和知讷的出现使高丽佛教史大放异彩。但大藏经的雕刻并不逊色，在韩国文化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第一次雕刻大藏经始于第八代显宗时期，到第十一代文宗时，经过60年才以国力完成，并藏于大邱郊外符仁寺。高宗时期，因蒙古兵入侵又被烧毁。面对国难，高宗为得到佛陀的庇护，在江华岛过着避难的生活时，又花16年的时间，完成了8万4千大藏经的雕刻。

义天给教宗注入了活力。知讷清算从中国移植的佛教，提倡适合于韩人体质的新禅宗，大受国民的欢迎。但由于王室和民间的佛事过多，国帑和民财的消耗以及时间和精力上的耗费之大难以言形。更为不当的是，僧侣仗着自己的权势和

地位参与政事，乃至参加政权争夺。在私生活方面，他们饱食、逸居、游惰，甚至有些俗僧寻花问柳，沉溺于酒色。不仅如此，各寺院依仗寺院权势，兼并他人土地和农奴，掠夺他人奴婢，或者经营很多理财事业，作为寺刹的利源。

高丽时代虽然佛教大为兴盛，但不能不注意到 谶纬风水说或阴阳五行说的流行。在唐朝的影响下，谶纬风水说、阴阳五行说等迷信杂说，从新罗统一时代开始流行于佛教徒之间，到高丽时代这些迷信杂说更加盛行。高丽历代国王和贵族阶级与佛教一起惑信阴阳说、谶纬说、风水说等。宫内术士、卜士蠕动，出门、祈祝、看地相、造宫殿等各种活动都为阴阳宫或地相官的占奏所左右。太祖王建其人是有能力的、积极的。他虽然相信阴阳说、谶纬风水说但他并没有苟且偷闲，作了所有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高丽建国的伟业。然而在高丽中叶以后，平庸君主继承王位。他们为迷信杂说所吸引，不仅给执行政事造成许多障碍，国帑的消耗也十分巨大。

王室崇尚谶纬风水说、阴阳五行说，并在科举中设占卜一门，导致迷信邪说在国民中大为流行。从高丽中期开始，不知由谁编写的《道洗记》、《道说踏山歌》、《三角山明堂记》、《九变图局》、《神志秘词》等 谶纬风水书流行。所有的人都讲国都、阳宅和阴宅布局的祸福。国民在私人生活和活动中也讲究日期、方位、方向的吉凶。这样，高丽国民深深地陷入佛教信仰的泥坑，无法自拔。而且，他们为地理风水说和阴阳五行说的迷信信仰所吸引，完全失去了自立自尊的气概，将生存只寄托在浮屠和迷信杂说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的民族宗教神教也与佛教对立，具有

当的潜在势力。已经说过，在王建太祖的遗训里，要求举行向天灵、五岳、大川、龙神等土俗神祭祀的神教法俗八关会。它与燃灯会一起是高丽初期王室的两大活动。八关会本是高句丽僧侣惠亮逃亡新罗，劝真兴王新设的，后被王建太祖所恢复。太祖以后的历代国王每到仲冬，就在宫廷里为天灵、山川、诸神举行祭祀。特别是历代国王在国家和王室每逢大事之际，总要竭尽丹诚，为天象、山川、诸神举行醮祭。从高丽中期开始，宫中举行的八关会仪式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僧侣也参典，挂灯。人们难以辨认这是佛教仪式还是神教仪式。民间巫教即神教的根子是扎得很深的。据《高丽图经》记载，高丽人畏鬼鬼神，遇有凶厄或疾患时，便叫来巫觋举行诅咒和压胜，以此作为除灾免祸之法。

在高丽时代，中国的道教思想有不少影响。第十五代肃宗七年，在宋朝的影响下，曾在禁中为玉皇大帝打醮。第十六代睿宗时期、李仲若赴宋学道要，后回国。还是在睿宗时期，深信道教的宋徽宗向高丽派遣两名道士，在开京修建名叫福源观的道观，用羽流10余名。建福源观之后，道教渐渐发展起来，到高丽末，开京设有道教观祠⁵所，地方有太乙殿⁴所。这都是直属于王室的祈福消灾观祠，大众并没有广泛地信仰道教。

高丽时代，儒教受佛教势力之压，未能兴旺。第六代成宗时期，建国子监，经营学舍书斋，内建文庙亨祀礼子。然而到这时为止，儒教仍处于不振状态。至十一代文宗时期，侍中崔冲设九斋，教儒学。之后，出现教儒学的儒臣¹¹名，儒学突然兴起，但并未痛快地摆脱汉学教育的框框。第十六代睿宗虽沉迷于佛教和道教信仰，对儒教也怀有好意。他亲

自到文庙行酌献之礼，在国学设七斋，为培养儒生设置养贤库，使儒学一时有了生气。但此后儒学还是萎靡不振，只有几间房的文庙也无人光顾。

到高丽末期，法门紊乱，僧侣极为堕落。平时对儒学怀有好意的安裕引进程朱学，并与权溥、禹倬、白颐正等人一起进行宣传。从此儒教渐渐抬头，不久便有了盛运。

当儒教势力增大时，佛教界出现了一然、复丘、普虚、慧勤等名僧，他们想要亮起法灯。然而，这未能驱散教界内部厚厚的乌云。因为新兴儒林掀起了排佛运动，佛教和儒教继续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恭愍王时，妖僧辛吨失败，给以太学为中心的儒生排佛提供了把柄。之后，儒生出身的李穡、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竭力主张排佛。接着，因李太祖的革命，佛儒两教的斗争，即以儒臣的胜利而降下帷幕，佛教被赶出了朝廷。

第三章 朝鲜时代

李朝五百年一贯执行排斥佛教，保护儒教的政策。当然，佛教在世祖、光海君，正祖等时期也有过起死回生的时候，但大抵说来，李朝一贯推行的是镇压佛教的政策。

李太祖崇信祖先传承的佛教，尊敬僧人无学自超。然而，内部腐败的佛教不能为建国事业尽力，而新兴的儒生势力却是建国的支柱，因此李太祖也只好选择排斥佛教，崇尚儒教之路。他开办太学，修建成均馆文庙，供奉孔门诸贤和东方名儒的神位，广泛地录用儒生。后来，在定宗时期创办了五部学堂。儒者出身的太宗继位，对儒教彻底执行育成政

策，而对佛教则施行了彻底废佛弃释的高压政策。他极度限制寺刹数目，没收其田土和田丁，像对狗一样蔑视僧侣。于是，释氏僧侣已成为人间受排挤的存在。

李太祖为篡夺王权把郑梦周一党斥为谋叛，灭其六族。夺到王权之后，他又误杀了王氏宗族。接着，太宗对佛教进行粗暴镇压，因而民心丧尽，导致国民思想大动摇。但在太宗之后，出现了世上少有的英君世宗大王。他大力扩大了国家的版图，实行德政，奖励学问，儒林俊才辈出，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运动。于是，人心安定，儒教文化便奠基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世宗在心理是不反对佛教的。他为祈祷母后冥福，举办大法会，重建兴天寺，晚年营造了壮丽的内佛堂。然而，他也对佛教实行镇压政策，借口年终还愿，废除了每年在佛宇祈福和佛僧巡行街头祈福的经行仪式。同时，世宗将太宗并成的佛教 7 宗合并为禅教两宗，企图减灭佛教势力。这时，势力强大的太学生僧恨佛教，有的甚至要求斩高僧行呼。尽管如此，在这样激烈的排佛形势下，高僧已和仍致力掀起禅风，拿出《显正论》，主张佛儒调和。

世祖篡夺王位，杀了端宗和许多忠臣。因此，他的心极为不安。加上王太子突然死去，他有为太子祈求冥福，消灭罪障的心情。于是，他就兴办佛事，传播佛典，修建大圆觉寺，崇敬信眉、守眉等佛僧。所以，佛教托世祖的思惠，一个时期如获甘露。

到成宗时期，王室以振兴儒教为治国要道，对佛教的厌恶和排斥极甚。有的儒臣只要带点佛教味，就被斥为孔门罪人，赶出朝门，砸毁佛寺。到燕山君时期，由于他的狂暴，

佛寺、佛像被砸毁、砸烂，并把圆觉寺作为妓房。在他之后的中宗也是彻底镇压佛教的。他废除僧科制、拆毁寺刹，用收回的铜佛造军器。由于成宗、燕山、中宗三代的大镇压，佛教在社会上受到彻底排挤，未能成为在民众生活中活动的宗教。

佛教完全失去了社会性。在这时进佛门的人当中，有很多犯罪分子，或不愿意干活的懒汉，或想躲避兵役、课税者，或无法忍受官府의 苛敛诛求而逃出来的庶民和贱民，等等。

他们不勤奋修行，随便饮酒吸烟，甚至抢劫掠夺，危害不少。这样，佛门既有无赖僧，也有怀着牢固道心，为宣扬佛祖法门而修行佛仪、佛戒的人。在李朝统治的艰难环境里、出现了西山、松云、松月、碧岩、鞭羊、逍遥、幻寂等大德。

随着国家基础的稳定，儒教势力以成均馆、乡校和书院为中心成长起来。世宗使太子身着儒服，参拜成均馆文庙，作为立太子的礼式。文宗把更多的奴婢赐给成均馆和四部学堂。到世祖时期，依据韩明浚、李克增等人的上疏，建了尊经阁、典礼厅、亨官厅等，把成均馆大成殿分为东西两庑，下赐布帛和学田等。之后，历代国王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上文庙举行释奠祭。每月举行两次朔望祭，每逢国家大事在文庙举行各种祭祀。并且每逢祭事，国王亲临酌献。为了培养儒生，在成均馆设立大学。所以成均馆不仅成了政教的中心机关，而且是儒教的总本山。

乡校从高丽仁宗时期起就开始存在。李太祖即位，就在各府牧郡县各设一所乡校，到太宗时几乎已建设完毕。它与

成均馆一样，有文庙、明伦堂、两斋、两庑，祭祀也照成均馆方式进行。但进入李朝中期后，一部分乡校颓废，政府无力修复，弃置不理，只能在这里举行释奠祭和朔望祭。随着乡校颓废，出现了很多书院。书院是祭祀内外名儒贤臣的神位，用作儒教讲学场所的私设机关。趁乡校颓废而滥设的书院到肃宗时期一个邑就有几个。在一个道内，书院达80—90个。这些书院占有广大田土，不交税金，不服军役，成了游食、讲歪理、侵虐庶民的巢穴。到正祖时期，全国院祠达650个。出入这里的儒林张口夫子之道、仁义礼义，但都怀有恶魔之心，与中央政界朋党一唱一和，忙于陷害和谈论如何搞垮反对党。

儒教已成为指导国家的理论，当然冠婚丧祭和礼仪都已儒教化。在朝鲜常说的五礼仪，与其说是指吉凶宾军嘉，不如说是礼记和仪礼的混合物。在世宗时期，参酌中国历代礼书和高丽《古今详定礼》，撰成《五礼》。世祖时期，经修改并称《五礼》。成宗时期，进行再修改，称之为《国朝五礼仪》。从此，冠婚丧祭的一切礼式都照儒教风俗进行。此后，家家户户设神祠，供奉祖先神主，按身份阶位祭祖先，朔望日举行告祭，在四个仲月的忌日举行祭仪。这些均是有信仰的要素。

乍一看来，到李朝时代，政治、宗教和生活都是青一色的儒教。但被认为从儒教蜕变而来的阴阳说和风水说的流行，已成为一种民族信仰，对人民生活的拘束很大。朝廷也设了书云观或观象监，负责天文和占卜风水事务。王室的一切事宜均按占卜的时日、方位、方向等的吉凶来进行。一般民众的起居、冠婚丧祭、访问等一切有关生活事宜，均依方位、方

向、时间的凶吉而行动。为避免阴阳五行上的凶祸，几乎每天占卜、诵咒、供物。寄食于人类弱点的阴阳师成群地蠕动于城乡。

风水信仰从来为王室或贵族所垄断，主要着重于阳地风水。但到李朝时代，墓地风水已普遍化。认为墓地风水关系到一家一门的存亡和子子孙孙的祸福，谁都要尽力去选定墓地。不少人为选择大地而倾家荡产。所以，好不容易发现大地时，为了确保墓地，往往引起一个家族与另一家族的纷扰，发现吉地，但未弄到手时，就实行暗葬。这种风气一盛行，因为墓地的用地而出现的讼事很多。

道教到李朝时代也不那么兴旺，只是世宗时将李太祖时期设立的昭格殿提升为昭格署，在此向三清神及太一神、七星诸宿、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龙王神等举行祭祀。到中宗时，由于赵光祖一派儒臣的强求，废除了朝鲜唯一的道观。后来没有多久又重建，但在壬辰倭乱时期被烧毁之后就彻底废除了。中国道家的祭仪从此在朝鲜已永远消失。

与此相反，被认为是古朝鲜神教末流的巫教信仰大为流行。到李朝时，佛教受镇压，已从第一线败退。登台取而代之的儒教，作为大众信奉的宗教，内容贫乏，因而李朝前期好象显示出无宗教状态。这时，自古以来作为民俗信仰传下来的巫觋信仰便流入社会的表面，滔滔席卷一般大众信仰界。不仅如此，巫觋信仰已传入禁中，宫中设淫祀，有很多妃嫔、内人信仰。巫觋也参加国家祭祀。

随着鬼神教的兴盛，各城邑举行城隍祭。把洞祭、洞神祭或堂山祭作为生活条件的部落民举行共同祭祀的风习广为

流行。这跟古朝鲜的迎鼓、舞天或东盟楔饮一样，是国中大会的遗习。

仁祖时，基督教从中国传入。最初，儒教学者把它作为学问研究，后来出现信仰实践运动。肃宗时，教势有所发展。英宗时期，教势伸展到京畿各地和黄海道、江原道。到正祖时，它已蔓延到湖右一带。本来基督教与儒教思想习俗相反，朝廷视之为邪学，实行禁止和镇压的方针。正祖十五年，发生辛亥教祸。到纯祖时，由于辛酉大教祸、己亥教祸、丁亥教祸等三次大迫害，教徒也受了不少苦难。宪宗五年即己亥年，对基督教的迫害再次发生。在这次大迫害中，被捕后遭杀害的有秘密来朝从事传教事业的法国传教士 3 人和教徒 30 余人。朝廷为禁止弹压西教，发布斥邪纶音，励行五家作统法，搜捕西教徒。而基督教则置如此禁压于不顾，在地下继续进行布教活动。哲宗时期，禁压有所松弛，能公开进行传教活动，信徒急剧增加。哲宗十年，教徒达 16 万余人，西方传教士接连不断地来朝。

哲宗死后，大院君执政。他坚决实行不少改革，粉碎腐败的儒生巢穴书院数百所。但他是有政治目的的。高宗三年，他对天主教徒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使世界震惊。他彻底压垮了法国传教士辛苦数十年打好的地盘。在大院君执政的 10 年里，天主教徒在社会中不敢公开露面。然而，大院君下野后，在政府的默认下，天主教全力以赴地传教，扩大教势。在这个时期，国际上亦不能容许闭关锁国和对宗教进行镇压。高宗十九年（1882 年）三月，朝鲜和美、英、德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从此外国传教士能自由地进行布教活动，使天主教的伤口得以恢复。

李朝末叶，当儒教和佛教成为死灰，新出现的西学被歪曲地宣传为含有可怕读国祸端的时候，不知从哪来的一个名叫郑鉴录的谶书在流传。它说，不久李氏朝鲜要灭亡，郑氏朝鲜将于鸡龙山建都。它预言大祸将要来临，并指示了该去避难的地方。民众由于受尽两班土豪的暴力镇压和诛求，渴望着新国家的理想世界。李朝末，自然出现的很多类似宗教，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面貌。第一个利用这种社会情况建立宗团的是崔济愚。他将儒、佛、仙三教教理适当加以折衷，建立了东学，向庶民阶层宣传济渡众生，布德天下，保国安民。于是，众多民众归依东学，东学教势的发展呈破竹之势，震撼大地，引起了官宪的怀疑。就象西学一样，他们被视为惑世、诬民之徒。崔布德四年后为官宪逮捕，在大邱监狱被斩首。崔济愚提倡的东学由嫡传第二任教主崔时亨继承。他把东学作为宗教，将其教旨组织化，并渗透到社会底层。第三祖孙秉熙改东学为天道教，一时成为教徒达百万的朝鲜最大宗团。然而，从天道教分出侍天教，又从侍天教分出上帝教，并由东学系的一部分人创建了水云教。这样，天道教由于分派，势力便大为削弱。

属于神教系统的吡哆教在高宗初期由姜一淳所建。它与东学系各宗派对立，并在庶民中形成一大势力。姜一淳死后，教团内部出现分裂。从吡哆教分出仙道教（后来叫普天教）、无极大道教、甌山教、太乙教及其它宗教。神教系宗教于李朝末期复兴的有大倧教和檀君教。其后产生的有三圣教、箕子教、神理宗教、圣化教等。但是，它们都没有得到发展。只有大倧教以中国东满地区为中心有了较大的发展，拥有东、西、南、北4个教区，教徒估计有三、四